

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

专 题 讲 座

辽 宁 社 会 科 学 院
中共辽宁省委地方党史编委会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一 九 八 六 年 八 月



D23
23

D23
23

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

专 题 讲 座

辽 宁 社 会 科 学 院

中共辽宁省委地方党史编委会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一九八六年八月

编 者 的 话

辽宁社会科学院、中共辽宁省委地方党史编委会、中共大连市委党校，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三日至十七日在大连举办《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习班》，在讲习班上有十四位同志授课。为满足全国各地同志的需要，我们编辑了此讲稿。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在编稿过程中出现错误，诚恳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

目 录

关于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李 侃 (1)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研究党的创立时期的历史.....	李 璫 (13)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的几个问题.....	刘经宇 (29)
抗日战争中的几个问题.....	王秀鑫 (40)
关于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历史的几个问题 (提纲)	王 沛 (52)
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振霞 (67)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经验教训.....	金春明 (85)
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九·一三事件”	于 南 (99)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若干问题初探.....	温永录 (111)
中共满洲省委史的几个问题.....	张广恩 (129)
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几个问题.....	谭 译 (143)
关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几个问题.....	罗占元 (174)
如何认识国民党改组后的性质.....	王 渔 (198)
关于建国以来党史的几个问题.....	廖盖隆 (214)

关于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李 侃

一、研究重点的转移问题

中国近代史当前面临重要课题是什么？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想法。如提高史学理论水平和改进研究方法；打破僵化的教条束缚和死板的模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扩大史学视野；提高学术水平和增强社会功能等等。这些想法都很好，都是史学工作者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国近代史同样也面临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可以由某些权威和专家的一篇文章、一次讲话，或者由什么“天才”的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就可以迎刃而解的。展开讨论和“争鸣”，固然也很重要，有助于对问题的认识的逐步明确和逐步提高，但更重要的是要靠在研究的实践中去不断探索不断创造。

对于包括近代史在内的历史学目前的情况，我个人认为，三中全会以来是最好的时期、最繁荣的时期。讨论和争论的问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热烈；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多；成百上千的各种研究会、学会平地而起，各种学术讨论会经常不断。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学术空气浓厚，环境宽松和谐。这是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好局面，是来之不易的。

但是历史学的繁荣和活跃，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然是主要的方面，同时也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一些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不满足于历史学的这种现状，对于当前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对于史学理论和方法，感到陈旧、简单、甚至有些教条化和公式化，缺乏新意，迫切要求有所突破，有所改进，有所创新。也有些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学的价值和功能，也发生了一些疑惑：这样的历史学究竟有什么用？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说现在历史学面临着“史学危机”。这种说法未必完全确切，但这种感觉和说法，也是有感而发的，不能说是危言耸听和无的放矢。《历史研究》的编者认为：“所谓‘史学危机’实际上是史学正在发生转机，正在酝酿如何革新内容与形式，向着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更高的科学水平发展”。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对的。我们现在正处在以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心内容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这是一次革命，是一次深刻的历史转变，改革和开放，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史学工作者对以往长时间那种研究的内容和形式、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怀疑或困惑，要求突破、创新、发展，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向历史学和史学工作者提出的新问题和新的挑战。

历史学怎样突破，从那里突破？怎样创新，在什么基础上创新？怎样发展，向着什么方向发展？这是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学习、自由讨论、不断提高中去解决。这里我仅就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供同志们讨论，也请提出批评。

首先，我觉得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点，应该有个适当的转移。主要是向两个方面转移。

第一、从纵向的研究向横向的研究转移。就是把长期以来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以研究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为重点，转移到研究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更广阔的历史领域。

其实，这也并不是什么新的问题，毛泽东在1941年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明确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十分明显，他是主张由个别到一般，由分析到综合、由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所谓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和文化史，与综合性的中国近代史相对而言，它们都属于专门史，都是近代史的一个局部或一个重要方面、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就这些专门史本身来说，它们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整体，或者说是一个“系统”。因为每一门专史，又可分成许许多多的方面许多局部和组成部分。可以说包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多种社会生活因素的综合。也就是历史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以往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的缺陷之一，恐怕就在于忽视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基本上是集中于政治史，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对经济史也有研究，但研究的内容和课题，仍然是服务于或从属于政治史。思想史和战争史，也是如此。而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又基本上是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所谓“八大事件”为主要内容。翻开许多教科书、通史性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以至众多的论文、专著，似乎可以说很少超出“八大事件”的范围。内容和观点也是大同小异，或者基本相同。形成这种情况，有其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着重于政治史、反帝反封建斗争史的研究，这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当时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民主革命，向中国近代史工作者所提出的任务，是要去用历史事实说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由近代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与此同时，还要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过程，去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用历史事实去论证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个真理。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进步的历史学家，在进行这种研究和论证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人去命令他们这样做，而是出于历史学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革命斗争的需要联系起来，表现了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这种研究，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在解放初期，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目的，增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以往的这种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和所起的作用，应该给以充分的估计和肯定。

但是，在全国解放，特别是在经过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阶级以后，本来应该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来的同时，历史学研究的重点也应该有一个相应的转移。但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经济建设这个重

点的转移得很慢、很不好。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的历史学，仍然以阶级斗争，反帝斗争为主要内容，而且又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移用到历史学工作者本身上来，不断批判，不断斗争（思想改造、反右派、拔白旗、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影响，导致了近代史研究的简单化、片面化、公式化。以往曾经是新鲜的、积极的、所谓“八大事件”的研究，“两个过程”的阐述，逐渐变成了一种几乎固定的框框和模式。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整个中国近代史，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八大事件”，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就是那么一些人物，就是那么一些课目，就是那么几条道理。如果说在改革开放提出以前，问题还不那么尖锐、突出的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大量的新情况的出现和新问题的提出，再拘泥于以往的研究内容、课题、理论和方法，就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关切，也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当然在研究领域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开拓，应该说是在逐步前进。但是给人的感觉仍然是步子太慢，一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突破性的进展。旧的一套模式和方法，许多旧的研究课题，还没有明显的改变。很多研究内容和研究课题，似乎基本上还未超出“八大事件”的范围。我并不是说“八大事件”再不需要研究了，相反，应该继续深入研究，不过要从新的更多的角度去研究。如果还是局限于这些事件本身的发生过程和结局，有关人物的评价，以及对某些虽然争论不休但又很难提出新说新意的课题（例如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义和团的源流、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等等）就不但很难有什么突破。而且恐怕也不会再引起更多的兴趣了。

因此，应该把研究重点向中国近代社会更广阔的领域转移，特别是向经济基础，向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向各阶层、各地区的社会生产、文化思想、生活方面转移。就是说要从整体上更全面地更具体地研究中国近代的国情。诸如近代工业、近代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状况，水利和交通运输，商业和对外贸易，科学技术，学校教育、社会思潮，文化形态，生活方式，社会风俗，城市和乡村，各个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特点等等。有同志把这种研究叫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或者说更好地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把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结合起来，使得历史既不是单纯的时间上的线条联系，也不是单纯的平面拼合，而是一种立体的人类社会历史结构，并且要把历史感和现实感更好地统一起来。

第二个方面，是把研究的重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到前八十年，向“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后三十年转移。这是与现实社会生活距离更近的历史，而且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更密切、影响更巨大的历史。按照正常的情况，这段历史本来应该引起更高度的重视，引起更多学者的深入研究。这三十年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可以大大超过了前八十年，这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三十年，甚至是改变整个亚洲形势、直接影响世界形势的伟大转折的三十年。我们通常把这段历史叫做现代史，或作为革命史，也有很多同志从事研究，但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同样比较狭窄。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研究这三十年历史的学者多起来了，成果也多起来了。但相对而言，“五四”以后三十年的历史研究仍然显得薄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清楚的：①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研究者不能也不敢去涉足这个与现实政治、政策，与党的路线方针有着密切关系的历史“禁区”。因为研究这段历史与党的历史、与革命斗争的历史密不可分，因此，研究者只能在已有“定论”的、被允许的范围去解释某些问题，而不能作为学术问题去进行独立的、自由的研究、讨论。②资料上的

困难，因为很多重大历史事实，都涉及党的历史，党内的许多档案、文献是不能利用的，而当时对党史又是大讲所谓“党内七次路线斗争”史，实际上是对党史的歪曲，违反了历史事实，可是当时研究者又不能更不敢去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去澄清和纠正被歪曲了的历史事实。③研究这段历史，很容易“犯错误”，而这种“错误”是犯不得的，犯了就是“政治问题”，研究者不敢冒这个风险。大家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不但陈独秀、胡适，连李大钊同志都不能讲。“五四”新文化运动只剩下一个鲁迅，党的创始人，只剩下毛泽东等极少数几个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这方面的某些“禁区”开始打破或正在打破。在“五四”运动史、抗日战争史、民国史、中共党史（特别是党史人物）等领域都有了重要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果。可不可以设想，为了推动和加强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三十年历史的研究，也象把前八十年的近代史分成“八大事件”那样，也把这三十年的历史划分为“八大事件”，即“‘五四’运动”、（包括共产党的成立）“北伐战争”、“十年内战”、“九·一八’到‘七·七’”、“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

这“八大事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开端到胜利的全过程。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三十年，它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巨大而深远。又因为这些事件，距当代社会生活较近，把这三十年的历史研究得越清楚、越透彻、越深刻，也越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的国情和现状，越有助于现代化。和前八十年比起来，虽然距当代近一些，但实际上也不那么近了。且不说“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快近七十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已经三十七年了。现在我们讲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好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其实在建国当时，距戊戌变法还只有五十一年，距义和团运动只有四十八年。那时候还有一些参加过和经历过变法的人（如张元济、沈钧儒等）和义和团的人，而现在则没有了。连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也数不出几个了。现在很多老一辈的革命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写回忆录，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说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五四”以后的三十年，并不是说要孤立地去研究这些事件，而是要把这三十年作为一有机联系的整体，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把历史过程和社会变动结合起来。我想这对提高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水平，开阔眼界，了解国情都是有幫助的，对增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也是有好处的。研究中国近代史，而书不读“五四”以后，文不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注意力不及四个现代化，这是很不正常也很不应该的。恐怕外国人在这方面所用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且不说出于什么动机和政治倾向）比我们还要多些。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事实上也正在改变。

二、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

如果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还有一些薄弱环节，或者本来应该深入研究而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之一，我认为农村和农民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八十以上。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和无产阶级的最可靠最广大的同盟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决定中国近代历史命运的有三种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近代新兴的阶级。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以前，农民和资产阶级曾经是扮演主角，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比，农民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阶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主要的物质资

料的生产者，又是被压迫被剥削者。在近代中国新兴阶级还未产生和形成以前，以农民为主体，发动过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发展到最高水平的农民战争，也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终结。在资产阶级产生和形成以后不久，它就领导和发动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戊戌和辛亥之间，还曾经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在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这半个多世纪中间所发生的这四次重大历史事件，有两次是农民发动的，有两次是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这些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课题载入史册，并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成绩显著。但比较而言，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联系得比较密切一些，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也比较广阔一些。而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与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联系则不那么密切，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也相对地显得狭窄一些。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当然还需要深入开展，对已经提出的或还未提出的问题，当然也还要继续讨论、挖掘。与此同时，我感到应该把范围扩大、延伸，扩展为对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

我们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如果不能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主要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 and 提高农业生产力问题，任何改良和革命都会因为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失败。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也要落空。这里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中国历史。由清朝统治阶级的洋务派所倡导的，以求强求富相标榜、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他们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引进了一些近代技术，聘请一些外国技术人员，也相应地开办一点新式学堂。倡导者们以为举办这些“洋务”，就可以使中国转弱为强，转贫为富。结果是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不止一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洋务派根本不去也不可能去注意农村问题和农民、土地问题，他们是要把近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移植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在保持封建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去搞近代化的“洋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在帝国主义的控制、奴役下去搞近代化，当然只能是一种妄想。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锐意维新变法，上书言事，慷慨陈词，改革政权机构、推行新的制度法令，办学会，出报刊、改科举，兴学校，一时生气勃勃，颇有改弦更张，改革旧制的气象。然而，他们把维新变法事业局限在一部分开明士大夫和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圈子之内，非但不去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而且对农民心存恐惧，生怕农民起来造反，危害清朝的封建统治。软弱的资产阶级不但不敢也不能领导农民解除封建压迫，反而把农民当做异己的力量加以敌视。变法失败的原因，也不止一端，但完全抛开农村和农民，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似乎开始注意到农民和土地问题了，在同盟会的纲领上写上了“平均地权”的内容，但是却没有真正实行。这次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是并没有造成农村封建秩序的大变动，当然更谈不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也没有改变，结果仍然是一次失败的革命。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以前，在中国没有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真正在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认识到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农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巨大作用，从而能够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把广大农民从封建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

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改革土地制度，然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

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范例。

那么，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不是就一劳永逸地完全解决了呢？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就完全清楚了呢？历史和实践证明，情况并非如此。

在解决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后，原来以为可以用互助合作的办法，用农业集体化的办法，来发展农业生产力，逐渐缩小以至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并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然而，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农业生产互助和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实际上不但并没有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农村推行并不断完善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地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逐步完善，农村的商品经济有了很快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现实生活又一次显示了八亿农民和农村在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的作用和巨大的政治、经济潜力。

我很粗浅也是很直观地感到，多年来我们对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是做得很不够的。如果说也有研究的话，恐怕也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两次运动上，而对这两次运动的研究，又是比较多的集中到关于运动的性质、评价和历史作用以及事件发生、发展和失败的过程，战争的攻守进退、人物的是非功过等等问题上。这种研究当然也是必要的和重要的，然而以往的这种研究的着眼点和研究的范围和课题，还远远不能科学地、历史地说明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举例而言，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中国近代史的教材，大都没有或很少有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论述，而有关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也很少。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甚至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当时的情况比起来，还要冷落，就连象土地改革那样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全国规模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运动，至今也还没有专门著作，连这方面的论文、资料也很少。倒是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教授在占有大量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写了一本《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有英文和中文版两种版本）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感觉到对近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从历史到现状的发展过程，似乎有再思考、再认识的必要。我们在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问题上所发生的失误和曲折，当然是在政策上的偏差造成的。但同时也同对农村和农民的历史认识不那么清楚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们还都记得，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讲过的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指出当时在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占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性质、形态，毛泽东分析说：“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我们虽然解决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但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随后，他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的著作中，强调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就是对近代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清醒估计和精辟分析，对近代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历史和现状的科学概括。这也就是重要的中国国情。可

惜，在建国以后近三十年中，特别是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对农村和农业的政策，并没有从这个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出发，而是过分强调和人为地加速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和不断反对和批判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一系列“左”的思想指导下，不但忽视而且实际上取消农村的商品经济。以致农村和农民的贫困落后面貌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

既然清醒地认识到建国初期的广大农村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所谓古代，也就是封建时代，那当然就是说分散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还普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很不发达。农村和农民的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的情况还没有改变。不但根本谈不上现代化，甚至还没有进入近代。可是就在一九五五年以后，却一下子就实现合作化，在一九五八年又一下子实现人民公社化。生产关系接连不断地急剧变化，大大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不但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完全违反了按劳取酬和物质利益原则，严重地束缚和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又要在根本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农村和农业生产中不断地批判“资本主义”，在连“资本主义”的躯体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去割什么“资本主义的尾巴”。把集体农民的一点自留地，养几只猪和鸡，在庭院植几棵树，和搞点其他副业，统统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去“割”。结果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造成了农村和农民的普遍贫穷。

在“左”的思想影响之下，在学术自由讨论受到限制和抑压的情况之下，对于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状况、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商品流通和交通运输的状况，农村和农民的思想文化状况等等问题的研究，几乎都排除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有的全是“到处莺歌燕舞”，一片虚假的赞词和颂声。而缺乏实事求是的符合实际的研究，这当然不能责怪研究工作者，一则条件不允许，再则研究者也不敢冒这种政治上的风险。这当然也不是说，有了这种研究，就可以改变当时的农村和农业政策，因为当时学术研究根本起不到这种作用。但是如果能有的一些实事求是的研究，至少可以使得作为历史学研究者的头脑清醒一些，或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调整和改善农村和农业政策。

现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就农村和农民思想文化来说，阻碍改革的是什么？农民很自然地要想到平均主义，或叫“大锅饭”，还有各种不正之风，以及以各种不同形式反映出来的封建思想残余等等。

以平均主义而论，它可以说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独特意识形态。孔子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子》中有“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说法。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政治家，也曾提出过“均田”的主张，龚自珍写过《平均篇》，都是要用平均的办法来调和阶级矛盾。至于历代农民起义，莫不是以平均社会财富，反对封建特权为号召，如“均贫富、等贵贱”等等。到太平天国起义，可以说把平均主义发展得更全面，也更“彻底”而理想化了。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中所描绘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在反对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斗争中，也确实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它又是不可能真正现实的幻想。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思想，在社会生产力很低下，要绝对平均分配有限的社会财富，实际上就会“平均贫困”而起义的农民领袖一旦夺取了全国的或局部的政权，他们“平均主义”就被宗法等级制度所取代，照样

维护封建制度、封建秩序和封建观念。平均主义既是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思想遗产，又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负担。它根植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土壤，是农民小生产者的心理和意识。很值得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它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正本清源，以有助于克服这种妨碍四化的平均主义思想观念。

这里，还想从历史的角度，简单谈谈农村文化问题。如果说以往对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得不够，那么对农村文化的研究就更差了。前面提到，在建国初期，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那么农村和农民的文化生活差不多也是停留在古代。首先，必须承认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在农村人口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文盲。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在科学文化方面仍然是落后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全民族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对于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并没有在广大农村和农民中广泛传播。不论是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权、平等、自由等学说，以及“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对广大农村和农民来说，都是陌生的和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东西。长期的封闭、落后状态，必然造成思想文化的闭塞和蒙昧。而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价值观念以及旧的习惯势力，又长期影响着渗透着农民的思想意识（如家族宗法观念、在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某些封建迷信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变农村科学文化落后的状态，甚至比改变经济贫困更为艰巨。

不论从农村和农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来看，和从农村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提出的新问题来看，都是近代史应该着重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不真正了解农村和农民，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和认识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社会，不解决农村和农民在经济、文化上的贫穷落后状态，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农村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也是深厚而广阔的历史领域，不论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在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都有许多问题可以研究。而如果再象以往那样，把研究的范围和着眼点限制在“八大事件”的框子里面，恐怕农村和农民问题就还会是得不到开拓、耕耘的历史处女地。这个状况，需要改变，也一定会改变。

三、中国近代文化问题

沉寂、枯萎的近代文化史，近几年来顿呈活跃、兴旺之势，人们把这种情况叫做“文化热”。近代文化史的讨论和研究为什么“热”起来？这并不是由于什么人的爱好和提倡，而是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政策和现实生活向理论界、文化学术界（包括史学界）提出的重要课题。文化的定义是什么？近一个世纪以来，争论不休，说法各异。据有人统计，单是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一百六十多种，在国内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各持一说，恐怕永远、至少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会有一个“公认”的“定论”性的定义。不管有多少分歧，有一个说法大概不会很错，就是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延续和总和。而就作为意识形态和精神财富的文化而言，它比物质财富或物质文明，更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具有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不管什么时代，也不管那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都不可能与传统“彻底决裂”，一刀两断。文化作为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当然需要不断更新、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但这种更新、进步、发展，一方面要受社会物质资料

生产水平，即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时也要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社会大变动，都要在文化上表现出来。在近代中国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从外国侵略者用武力和鸦片打开中国闭关自守大门的鸦片战争开始，在文化问题上就开始了中西文化的冲突、斗争和交汇、融合。从魏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提倡“新学”，反对“旧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都是围绕中外文化（或叫“中西文化”）和新旧文化（或古今文化）的关系，展开的辩论与斗争。而“五四”运动则是这种矛盾冲突的总汇集和总爆发。“打倒孔家店”和反对旧思想、旧礼教的斗争和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标志着在文化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五四”运动在文化上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可低估，更不会磨灭。但五四限于当时的条件，也产生了片面性和形式主义的缺点。以后的“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的文化主张，都各执一端，当然争论不出什么结果，事实上也都行不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文化问题上，也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历史总结，并指出新文化的方向。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中西文化的撞击和交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矛盾和互相关系，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在文化问题上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正是近代文化问题与现实社会生活”与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两个文明的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文化热”兴起的同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讨论和研究，也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因为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许多问题，都还在近行探索和讨论，有共同的意见，也有分歧的意见。究竟主要问题是什么，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应该那里着手，从那里突破，对于这些问题，我无力判断，也更无力回答。只能就感想所及，谈一点比较直观的和非常粗浅的想法。

第一、看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得失优劣，主要就看这种文化是不是能给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注入新的活力，能不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中国近代文化之所以发生中西之争、新旧之争，就是因为在在中国被迫向近代起步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的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和国内国际形势之下，中国的旧文化，或者说传统文化、封建文化，虽然也有其精华和优秀的东西，但从整体来说，它不但不能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而且成为一种负担和阻力，即鲁迅说的“因袭的重担”。所谓“师夷长技”，“采西学”，“中体西用”以及新文化运动等等，都是为了民族独立生存、国家独立富强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当然由于“西学”和“新文化”的倡导者们的阶级立场、利益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时代条件不同，对文化问题的认识、态度和改造办法也各不相同，但总的

说来，整个近代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在文化上也是一次大的更新和大的转换。近代文化是与近代政治、近代革命密不可分的。这个文化的更新和转换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变化和曲折。有许多问题可以研究，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第二、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问题，是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问题，也就是人的文化教养、知识结构、精神状态、社会心理高低上下的问题。我们现在提出要造就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一代新人，其实稍为广义地说，这“四有”归结起来都可以说属于文化的范畴，也就是人的文化素质。我们中国号称“文明古国”、“礼义之邦”，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可以引为自豪的。但是中国古代文化，或者说“上层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广大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不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要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统治，在文化上和精神上也要受统治阶级的统治。时至近代，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在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冲击下发生了动摇，而文化的落后，也就强烈地表现出来。似乎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文化是既富有，又贫困，古代文化是富有的，近代文化是相对贫困的；统治阶级的文化是富有的，劳动人民的文化是贫困的。近代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使得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欺侮一百多年，也使得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觉醒。

由于整个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民族独立解放，因此，不可能同时解决科学文化的落后问题。虽然当时也有些人提出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普及教育、发展科学、兴办实业，只能是个良好的愿望，而不可能实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人们的民族觉醒、政治觉醒和阶级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文化科学的落后状态却没有解决。就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并没有全面的提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国民的文化素质问题，如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意在培养和造就“新”的国民，孙中山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依次实行“军政、训政、宪政”的方案，鲁迅曾着重研究过国民性问题。当时的改良派认为中国人“民智未开”，还不能实行共和民主，革命派认为经过革命锻炼，实行“训政”（当然不包括蒋介石为了建立独裁统治而实行的所谓“训政”。）就可以提高国民的政治觉悟，鲁迅则着眼于国民性的改造，改变封建统治长期以来对国民的精神奴役所造成的“阿Q”性格。应该说，从教育救国到国民性的改造，都有其合理的积极的因素，都是出于爱国自强的愿望。在当时又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过去认为这些主张，都是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而加批判和否定，看来这种批判和否定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应该肯定这些主张的合理部分和正确部分。当然也要看到其中确有某些不切实际的和错误的东西。

在改革和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伟大战略任务新的历史时期，在前进的路道上所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人才的缺乏，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与四化不相适应。因此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要大力进行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也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在这方面，应该说是深刻的历史教训的。我们既然承认中国近代经济文化落后这个历史事实，在全国解放以后，就应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加强文化教育，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当做战略任务。然而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文化教育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左”的流毒，愈演愈烈，轻视文化，轻视知识，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终至发生了象“文化大革命”那样历史大悲剧、大倒退，把摧残文化、毁灭文化叫做“革命行动”。所谓大破“四旧”，实际上变相地提倡“四旧”。现在，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十

年内乱，十年浩劫，稍做一些历史反思，就会有很多沉重的痛苦教训。当时那种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无以复加的个人迷信，对文化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血统论”、“唯成分论”的叫喊，乃至打砸抢抄抓，等等等等，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整个民族文化素质低下，甚至低下到愚昧程度的反映。“文化大革命”是最不文明的集中表现。而且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完全彻底消除。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彻底否定和消除它的恶劣影响。现在我们不断强调的反对各种不正之风，在社会风气中经常发生的一些令人痛心和忧虑的现象，诸如不讲礼貌，不讲道德，不讲纪律，以及某些丑恶现象和犯罪活动，可以说其中有很大的成份，是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文化教养有关。也同“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洗礼”有关。我想这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不能不注意的问题。

第三、近代文化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是一个综合的由多种侧面多种因素组成的整体结构。从学科来说，它又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学科。只要涉足这个领域，就会感到问题很多，涉及的领域和方面很广，简直感到无从着手。我想这并不奇怪，一则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基础相当薄弱，甚至简直成了空白。现在只是刚刚起步，大家都在摸索，都在思考，也都在尝试。至少已经提出了不少意见和设想，并且也有了一些研究成果。我想不论问题如何复杂，也还不外乎这样几条途径：一是对近代文化做宏观的整体的考察，去发现它的历史特点，发展变化过程及其客观规律；二是从各个侧面、各种专门学科、专门问题入手，就某些文化现象、文化领域问题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和研究，诸如把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宗教、伦理、哲学、科技、风俗等等，纳入整个社会文化动态中进行研究；三是对中外文化、地区文化和古今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至于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探讨和创造，那当然就更需要提倡自由讨论，勇于创新了。在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方面，上海是走在前面的，关于上海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许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也开过多次国内学者的专门学术讨论会，还开过文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也在开始这样做。其他一些地区和有关学术机构也开始对文化和文化史问题引起重视。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的繁荣局面正在出现，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得到可喜的进展和收获。

×

×

×

×

上面讲的这三个问题，都是感想式印象式的临时发言，既谈不上学术，也更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想法，也免不了浅薄和谬误。我之所以不揣浅陋，提出这些问题和想法，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要使近代史的研究，尽量不要脱离现实，历史学做为—门社会科学，它如果完全漠视社会现实，不能从历史和现实联系上，回答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要问题，那么它必然减弱以至取消自己的社会功能，从而被现实所冷落，甚至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或只供少数“同行”欣赏、谈论的东西。所谓“史学危机”或历史学的某些“不景气”，恐怕也就包含这个意思在内。我并不主张象过去曾经提过的“历史为政治服务”，更不赞成实用主义地要历史学“配合”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把现实与历史作简单的类比。但我总觉得历史学的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总要给人们以智慧、借鉴和启示，总要有助于人们从现实与历史联系和发展中，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看到历史前进的趋势，也看到历史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从

而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更加自觉地创造历史。我想，这是我们历史学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与时代责任感。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对近代中国许多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和历史的再认识。有许多问题，要我们去进行重新思考和研究。我们有责任，也应该有这种勇气，自觉地肩负起这样的使命，做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无愧于人民和前人的史学贡献。我不敢说我的这些想法，对同志们是否有值得参考的价值，但是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有比我的想法更好更深刻的意见。做为一个史学同行的一孔之见，谨向同志们请教，也请同志们批评。

（附言：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基本内容是在今年义和团运动学术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研究党的创立时期的历史

李 樾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三年五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这四年的历史包括正式建党前的酝酿准备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一大”以后经过领导广泛的工人运动而和本阶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完成自己的创立过程。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开创了革命发展的新局面，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走向高潮的起点，所以，从“三大”开始，党的历史进入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研究党的创立时期的历史，有些同志可能认为史料不多，问题比较简单，分歧意见不大，因此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多。实际上，这个时期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笼罩全局”的，是关系到整个党史的。所以，党的创立时期的历史是有很多值得下功夫深入研究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工作者对党的创立时期历史的研究工作，取得很大进展，这是主要方面；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同志们要求介绍一下党的创立时期的研究动态，我个人了解的情况不多，看法也不一定正确，仅把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存在什么不同意见，向同志们介绍一下，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种意见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种意见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支部组织的直接结果。创建中共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的根本途径。

第二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怎么开始的。

一种意见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五四”运动以后，一九二〇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探讨建党问题。他们在准备建党的过程中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

一种意见是，一九二〇年四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帮助建党。在这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一个人考虑过、提出过建党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一大”的召开。

一种意见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所开展的各项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召开党的“一大”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